

经筵讲学对北宋经学的影响

姜 鹏

〔摘 要〕 考察宋仁宗时代的经筵官构成,会发现其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仁宗早期的经筵官仍然以注重章句训诂为主,到后期则注重经典诠释的新型经学家开始逐渐进入经筵。这一变化与北宋经学从汉唐旧传统中独立出来,逐步形成经学新传统的进程是同步的。而经筵作为对帝王进行经史教育的制度,它的存在显然对宋代经学的具体内涵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士大夫把这个制度平台看作参与政治的渠道,希望通过诠释经典来规范帝王的行为准则,并进而影响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思想何以能被宋儒重新发现、反复言说,并成为经宋学的核心内容,才能得到理解。进一步而言,道学在宋代的产生,也是和经筵这一特殊的政治参与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 经筵;经宋学;道学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3)05—0046—08

〔作者简介〕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200433

一 孙奭系讲官的进退

经筵作为对帝王进行经史教育的制度,在宋仁宗时代定型。分析仁宗早期的经筵讲官构成,不难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讲官都与孙奭有关,在学术背景和说经风格上,也都与孙奭接近。他们构成仁宗经筵中的“孙奭系”官员,也代表着汉唐注疏经学的遗绪。

从学术特点来看,孙奭除深谙礼仪典制外,特长于文字音训。宋兴以后,自太祖至仁宗初年,有持续的校刊、整理经史、诸子文本的活动,太宗、真宗两朝尤其活跃,至仁宗天圣间经学典籍的整理工作基本告竣。^①孙奭是这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成员。端拱二年(989),孙奭中九经科第一,真宗时期参与《七经疏义》的整理,此后至仁宗初年,并参与校订《孟子》、《庄子》、刘昭所注《续汉志》、《刑统》等,为《孟子》、《册府元龟》、《律》文撰注音义。^②经过宋初学者的努力,《十三经注疏》体系最终在南宋形成,而其中的最后一种《孟子注疏》尚假孙奭之名以行,虽说是伪作,但仍体现出孙奭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把宋初这一系列经史典籍整理活动视为以音读训诂、阐释典章为核心的汉唐注疏学的余绪,而孙奭则是这一序列学者中的最后一位大师。

仁宗初年率先与孙奭同侍讲席的冯元,曾是孙奭的学生。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因擅长说《易》而受真宗赏识,侍讲于宣和门北阁。大中祥符七年(1014),重刻《易》、《诗》板本时,与陈彭

① 仁宗末期嘉祐(1056—1063)年间曾校刊七史,神宗熙宁(1068—1077)也有一些相关活动,但大规模的经史校刊,已在真宗后期至仁宗早年完成,参王应麟《玉海》卷43《开宝校〈释文〉》至《景德校诸子》诸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联合出版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第2册,第812页下—815页上。

② 参宋祁《孙仆射行状》,《景文集》卷60,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088册,第588页。及王应麟《玉海》卷43《开宝校〈释文〉》、《端拱校〈五经正义〉》、《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景德校诸子》,卷44《诸〈尔雅〉》,卷46《续汉书》、《八志》,卷54《景德〈册府元龟〉》,卷55《祥符赐〈庄〉〈列子〉》,卷66《建隆新定〈刑统〉、编敕》、《天圣〈律〉文音义》等条,第2册,第812页下—813页、814页下—815页上、823页下—825页上、863页下—864页上、1031—1032页、1055页下、1254—1255页上、1258页。

年共同校订。^① 宋祁所撰《孙仆射行状》与《冯侍讲行状》，都指出冯元和孙奭之间的师生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学术风格的同构性。^②

天圣间的孙奭，已经年逾花甲。天圣九年（1031）七月，七十岁高龄的孙奭致仕回乡，而仁宗的经典教育尚未能告成。所以这一年三月，孙奭在回兖州的前几个月，在中书考察四位年轻的国子监或诸王府讲官解说经典的能力。^③ 从景祐元年（1034）崇政殿说书的设置与人员任命来看，这次试讲正是为弥补孙奭离开后的经筵讲席空缺而作准备。应试的四位讲官是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秘书丞、诸王府侍讲赵希言，殿中丞、国子监直讲郭稹，左赞善大夫、国子监直讲杨安国。景祐元年设置崇政殿说书，同时任命了四人：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除了郭稹换成了王宗道之外，其他三人都相同。据《宋史·郭稹传》，之所以崇政殿说书的名单里没有他，乃是天圣九年孙奭推荐他试讲中书时，他即坚辞的结果。

对这几个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首先，根据《宋史》各本传，试讲中书的四人名单是孙奭定下的。试讲的结果，孙奭盛称贾昌朝说经“有师法”。王安石所撰《贾魏公神道碑》也说贾昌朝“治经章解句达”、“于传注训诂不为曲释”。^④ 流传至今可见的贾昌朝著作，仍有一部《群经音辨》，该书分为“辨字同音异”、“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辨字训得失”。从重视章句音训的角度看，贾昌朝的经学路数与孙奭一致。王珪为贾昌朝所撰《墓志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后来为《宋史》贾昌朝本传等传记资料遵引：

孙宣公初判监，命学官各讲一经，独称公所讲有师法。一日往谒宣公，宣公遣人示唐相路隋、韦处厚传，公读已，宣公乃出，见公曰：“后当以经术进，如二公，愿少勉之。”^⑤

王珪还谈到，孙奭想推荐贾昌朝来替代自己为仁宗说经，王安石的《神道碑》也说崇政殿说书是专为贾昌朝设置的。这些说法，未必尽如事实，但说明一个问题，在晚辈中最能以学术路数相同而博得孙奭赞赏的，的确是贾昌朝。

郭稹早年任国子监直讲时，曾因资历浅而险些被发还河南作主簿，由当时的判监孙奭、冯元保奏才得以留任。石介在一篇文章里，直接认为郭稹是孙奭的门生，并称孙奭乞骸骨的奏章是郭稹起草的。^⑥ 孙奭告老后回到兖州，而那时石介也正好在兖州。石介另一篇文章《孙少傅致政小录》记载了他和孙奭的接触，所以关于郭稹和孙奭关系的叙述，应该可信。^⑦

杨安国的父亲杨光辅是一位老经师，密州人。孙奭知兖州时，曾举荐杨安国为州学讲书。后来杨安国任国子监直讲，也是孙奭和冯元保奏的。《宋史》本传称他“讲说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虽然是一个贬义性评论，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杨安国是一位遵守注疏的传统学者。^⑧

仁宗的早期经筵讲官中，除了以上列举的以外，和孙奭有着各种关系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赵师民等。^⑨ 我们可以确定，在仁宗早期经筵中，大部分讲官诠释经典的风格是与孙奭接近，或受孙奭影响的。我们将这批讲官统称为“孙奭系讲官”。

经筵中这一人事结构特色，和当时人们对于经学诠释的一般认识相匹配。宋初科场有一桩非常著名的案例，真宗景德二年（1005）取士，有声于场屋的李迪和贾边意外地不在礼部奏名内。考官重新阅卷后，发现李迪作赋落韵，贾边则是在释经时作出了与注疏迥然不同的解答。参知政事王旦

① 王应麟：《玉海》卷43《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条，第2册，第814页下—815页上。

② 宋祁：《冯侍讲行状》，《景文集》卷62，第1088册，第601页上。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三月己巳条，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5册，第2556页。

④ 王安石：《赠司空兼侍中文元贾魏公神道碑》，《临川先生文集》卷87，《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刻本，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第155册，页1b。

⑤ 王珪：《贾昌朝墓志铭》，《华阳集》卷56，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093册，第409页下。

⑥ 石介：《释疑》，《徂徕集》卷9，中华书局2009年标点本，第99—101页。

⑦ 石介：《孙少傅致政小录》，《徂徕集》卷9，第101—102页。

⑧ 《宋史》卷294《杨安国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8册，第9828页。

⑨ 《宋史》卷294《赵师民传》，孙奭宰兖，尝辟师民为说书，并赞叹他的学问，第28册，第9823页。

以为：“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最终的结果是李迪被录取，而贾边落榜。^① 这一在经学上的保守姿态，与仁宗早年间筵讲官的构成正相应。

但从仁宗中晚期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孙复虽因讲说多异先儒，而被拒诸经筵之外，同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却在经筵足足呆了四年。仁宗晚年出现在侍读官队伍中的欧阳修、刘敞，侍讲官队伍中的吕公著、司马光，都不能以孙奭系尊崇汉唐注疏的学术风格相归囿。尤其是欧阳修和刘敞，身为北宋疑经风潮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此时他们在学界已经崭露头角。更有意思的是，至仁宗晚年，资深讲官杨安国死，其讲经“一以注疏为主，无所发明”，转而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与当年孙复因讲说多异先儒而被拒诸经筵之外，形成鲜明的对比。

康定元年(1040)始担任侍讲官的王洙，在经筵任职十八年，是仁宗中后期在经筵时间较长，也是较为重要的讲读官。王洙曾针对其他学者在解释经典时“改字就义”的现象提出过批评。^② 王洙这一批评透露出的信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恪守章句训诂的解经家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改字就义”的新型学者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发挥影响力。仁宗晚年进入经筵的刘敞恰恰就是引领解经“改字就义”风潮的代表性学者。《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刘敞《七经小传》：“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③ 刘敞母亲出自王氏，与王洙有舅甥关系，不知王洙“改字就义”的批评是否就是针对刘敞。

在学者的私人研究中，抛开先儒注疏，独立发掘经书义理的现象早已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中晚唐的《春秋》学研究。韩愈一联广为征引的诗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被视为这一现象简单而有力的概括。^④ 到宋代《春秋》学的新型研究仍然在延续，并有大量著作被传世。^⑤ 而“议论有异先儒”也并不仅仅出现在《春秋》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刘敞和他的《七经小传》。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引《国史》：“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⑥ 《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说亦往往穿凿与安石相同”。^⑦ 庆历前后学风的变化，情况复杂，吴氏《漫录》将这件事归入“事始”类，截然以《七经小传》为断，以区分新旧学风，未知尽符史实否。但《七经小传》在那个时代，作为改变学风的重要著作之一，则是没有问题的。除了上文提及的相关《春秋》学的研究外（刘敞本人也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春秋》学研究者），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诗本义》等，也是属于这个系列的著作。通过仔细检读欧阳修的《文忠集》和刘敞的《公是集》中所保留的相关交往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存在一个致力于用新方法、新视角探研经史的士大夫小集团，欧阳修是这个集团的领袖，而刘敞则是中坚之一。不仅是新的经学视点的出现，而且因为重新构建新经说寻找比较可靠的历史证据，由此而引发的考古兴趣，导致金石学的出现，也与这个集团的活动有极大的关系。

伴随着新旧经学的交替，广义上的孙奭系讲官，亦即恪守章句训诂的传统经师也渐渐从经筵中消退。存在于士大夫中的新经学风潮，和以帝王教育为目的的经筵活动并非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它们之间的交叉也并不仅仅是持新见解的学者进入经筵，而对经筵教学内容产生影响。笔者以为，恰恰是经筵成就“帝王之学”的教学要求，对北宋中期新经学风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经筵的功能被设定为帮助皇帝学习、探索治道，在这一前提下，宋人如何理解“帝王之学”，既是经筵讲学

① 《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上册，第286页下。

② 《王氏谈录·解经》：“学者解经，或有改字就义者，非先儒阙疑之旨，往往自取议。”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62册，第588页上。按，该书旧不题撰人，四库馆臣谓为王洙之子王钦臣记其先公言行，参《四库全书总目》卷120《王氏谈录》条，中华书局1995年影印本，上册，第1035页中、下。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33《七经小传》条，上册，第270页下。

④ 韩愈：《寄卢仝》，《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卷5，《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刊本，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第116册，页3a。

⑤ 关于中晚唐《春秋》学研究，以及这一现象在宋代的延续与发展，参赵伯雄《春秋学史》第5章、第6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4—398、419—483页。

⑥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事始·注疏之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50册，第520页上。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33《七经小传》条，上册，第270页下。

的关键所在,也是影响宋代经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二 定义“帝王之学”

既然经筵的目的在于教会皇帝治国之术,那么治国之术的根本是什么?皇帝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习得它?难道和通常儒生那样寻章摘句就可以了吗?帝王之学的内容不应该是训诂章句,这一点经筵讲官们很早就有了认识。所以即便像邢昺、孙奭这样的传统疏经之家在给皇帝讲授经学时,也会注重归纳、总结为政原则。但如何去构建一套系统的、有别于普通经生士人之学的“帝王之学”,是邢昺、孙奭这一代经学家无法完成的任务。在长期的经筵实践中,邢昺、孙奭的后辈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道路,对“帝王之学”的认识逐步明晰,而且这套观念慢慢成为北宋中叶以后绝大多数士人的共识,并对宋代学术中标志性学派“道学”的诞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什么是宋人眼中的“帝王之学”?元祐更化时期最重要的经筵讲官之一范祖禹,曾采集上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下至宋仁宗时期,历代人君的向学事迹,编辑成8卷《帝学》,进呈给他本人负责辅导的宋哲宗,希望藉此增进小皇帝的向学之心。在这部书的第一卷里,范祖禹就对“帝王之学”下了定义,并作了系统阐释。范祖禹说:“帝王之学谓之大学。”随后引《礼记·大学》篇,对“帝王之学”的具体内容作出了阐述。范祖禹说《礼记·大学》篇所记载的就是尧舜之道,而帝王之学的目的,就是要“学为尧舜”。如何“学为尧舜”?其程序当然就是按《大学》篇中所陈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内容,依次递进。^①北宋政坛高层重视《大学》,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说详下)。在现存文献中,明确地将《大学》内容与“帝王之学”挂钩,并对之进行系统阐述的,范祖禹是比较早的一位。

《帝学》第三卷保留了一则宋太祖读《尚书》的记载。太祖读《尚书》,有一番读后感:“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邪!”范祖禹认为太祖有这样的读书心得,才真正达到了帝王读书的目的,因为“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②

通过这些文字,范祖禹在《帝学》中表达了两个重要观点,即第一,“帝王之学”的目的在于学为尧舜,习得的路径正是《大学》篇所揭示的八纲目;第二,“帝王之学”不能等同于寻章摘句的经生之学,要有能“措之天下”的经世效用。这两个观点在后世儒者中都得到了广泛响应。范祖禹之后的儒家学者,也正是以这两个观点为纲领,建构出了一套“帝学”观念。

比如,《大学》所述即“帝王之学”本质这一点,在南宋重要学者张九成等人的文字中都有回应。作为高宗时代重要的经筵官之一,张九成在《孟子解》中说道:

帝王之学何学也?以民为心也。夫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家国,曷尝不以民为心哉!苟学之不精,不先于致知,使天下之物足以乱吾之知,则理不穷;理不穷,则物不格;物不格,则知不至,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出而为天下国家,则为商鞅苏张之徒,以血肉视人,而天下不得安其生矣。^③

这段文字和《大学》理念之间的关系,无需多作解释。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张九成是将之置于“帝王之学”的框架下予以讨论的。此外,陈经在其《陈氏尚书详解》中也说:“自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皆帝王之学也。”^④

对“帝王之学”不同于经生、士大夫之学作阐述的文例更多,在北宋后期就比较流行。比如胡安

① 范祖禹《帝学》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696册,第731页下—732页上。

② 《帝学》卷3,第696册,第743页下。

③ 张九成:《张状元孟子解》卷2,《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刊本,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第4册,页2b。

④ 陈经:《陈氏尚书详解》卷17《说命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9册,第186页上。

国曾对宋钦宗说：“若夫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无益于心术者，非帝王之学也。”^①到南宋初年，连宋高宗都说：“有帝王之学，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中无一日废学，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为文也。”^②

除指出寻章摘句不是“帝王之学”外，范祖禹之后，如何反向定义“帝王之学”（即什么不是“帝王之学”），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士大夫们逐渐有了更为繁复的陈述。绍兴元年（1131）冬，南宋政局尚处于波动之际，刚担任起居舍人不久的廖刚就和宋高宗讨论起“帝王之学”来：

（廖刚）及为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览群书，亦可谓之好学。然帝王之学与文士异。”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与《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诚意，愿去末学之无益，坐进此道，则可以复群生矣。^③

廖刚所谈论的“帝王之学”，与范祖禹在《帝学》中下的定义有很强的继承性，即以《大学》纲目为“帝王之学”的根本。此外，还融进了《孟子》的思想。与范祖禹不同的是，廖刚对“帝王之学”的反向定义，没有停留在章句问题上，而是扩大到对“翰墨”等文艺形式进行排斥性处理。廖刚的言论是有针对性的，宋高宗不仅热衷于书法艺术，而且本人在这方面也有极高的修养。廖刚借此机会指出，宋高宗在书法这类非“帝王之学”的文艺追求上，耽误了对真正帝王之学的追求。

在宋代道学集大成者朱熹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我们能找到一则与廖刚的言论非常相近的例子。宋孝宗即位之初，朱熹就曾上疏言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孝宗认真向学：“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至于该如何讲究“帝王之学”，朱熹说道：

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④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八月，身为监潭州南岳庙的朱熹上了一道《壬午应诏封事》。前引这段文字即源于这道封事，不过已经被《宋史·朱熹传》简化，其原文可参文集所录。^⑤引文虽在原文基础上有所删节简化，但还是能比较清晰、全面地揭示出朱熹的核心思想。朱熹并没有一上来就阐述什么是“帝王之学”，而是讲什么不是帝王之学，“风诵文辞，吟咏情性”不是帝王之学，老子释氏之学不是帝王之学。然后朱熹才指出，帝王之学在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个论述理路和前引廖刚的言辞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高宗爱好书法，廖刚否认书法为“帝王之学”；孝宗爱好文辞和释老，朱熹否定文辞和释老为“帝王之学”。

廖刚和朱熹对“帝王之学”所作的反向定义，即什么不是帝王之学，虽然随着谏议对象改变而有所不同，分开来看这两例都是个案，把它们和更多排他性地定义“帝王之学”的文字合起来看，却能揭示出宋人对“帝王之学”内涵的认知越来越明确，同时也越来越窄化的过程。

比如绍兴元年，中书舍人洪拟转对时，向高宗论及“章句书艺为非帝王之学”。^⑥宋光宗即位之初，谢谔曾进十铭，其一有“帝王之学，匪艺匪文”云云。^⑦这两例言辞比较概括的总结，同样把文和艺排除出了“帝王之学”的范围，尤其是洪拟的言论，特为针对书艺，应该也是受高宗个人爱好的激发。我们把这些对“帝王之学”作的排他性定义作个汇总，范祖禹指出章句不是“帝王之学”，此后

① 胡安国：《上钦宗论圣学以正心为要》，《宋诸臣奏议》卷5《君道门·帝学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册，第52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己卯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27册，第3页下。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甲戌条，第325册，第658页。

④ 《宋史》卷429《朱熹传》，第36册，第12752页。

⑤ 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刊本，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第176册，页2b—4a。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癸卯条，第325册，第610页下—611页上。

⑦ 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标点本，第64页。

诸儒又补充了文学、释老、书法等也都不是“帝王之学”。然众所周知,宋代皇帝自宋太宗始就非常重视文学和书法。文学上,太宗特别重视《文选》,还召人编集过《文苑英华》。书法上,太宗曾设置御书院,并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擅长书法的文臣,比如以书法待诏的王著等。此后,学习书法更是宋代皇帝和宗室的重要传统。^① 仁宗早年所受的教育中,书法仍然是一项重要内容,史籍中屡有仁宗以飞白书或其他形式的书法作品赐予宰辅、侍从或经筵官的记载。仁宗的书法造诣,也被作为教育的重大成效,受到大臣们的赞赏。^② 仁宗在位四十余年,存留下非常丰富的经筵活动记载,从未见有大臣或经筵官就书法问题向仁宗提出过批评意见。在范祖禹担任经筵讲官的元祐时代,也不乏有年轻的哲宗向宰辅、经筵官等臣僚颁赐御书的例证。^③ 正是由于皇室传统中对书法学习的重视,宋代皇帝中不仅出现了宋徽宗这样的顶级书法家,宋高宗的书法涵养也足以使他的作品名垂千秋。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宋代皇帝在文艺上的成就,并不能简单地从个人爱好的角度加以审视,尤其是宋太宗对文学、书法、音乐的爱好,要置入宋初整个文治导向大背景下予以讨论才更有意义。^④ 即便是在政治上一再被讥笑为无能的宋徽宗,其独特的“瘦金体”,也被学者指出是具有政治功能的。^⑤ 然而到宋高宗时,皇帝个人的书法爱好却屡遭臣下批评,其原因是这种爱好妨碍了皇帝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真正的“帝王之学”上。这里我们看到了诸儒试图对皇室传统中的学习观念进行改造的努力,剔除由帝王主导的文治传统中的非儒学因素,代之以北宋中后期逐渐发明、积累起来的儒学传心法门。

在洪拟“章句书艺为非帝王之学”的言说里,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仔细阅读《帝学》,范祖禹所说“帝王之学”非章句之学,指的是帝王不能像经生学习章句那样学习经学,所以范祖禹的着眼点是经典学习方法。至于“帝王之学”和章句之学是什么关系,范祖禹则未加深入辨析。洪拟将章句和书艺并举,列入不属于“帝王之学”的排斥范畴,那么这里的章句之学就和书艺一样,是独立于“帝王之学”之外的另一门“学科”。“帝王之学”和章句之学虽然都以儒家经典为根本,但这是不同的两种学问,这个观点正是经宋学和经汉学分离的基础。它在范祖禹那里已经有了萌芽,到洪拟的表达中,已臻于成熟。虽然宋学家未必全不讲训诂,汉学家也未必没有天下关怀,但从宋儒要将帝王学习经典的旨趣从章句训诂中解放出来来看,“帝王之学”主要存在于经宋学层面,而章句之学存在于经汉学层面。

从宋初帝王学习兴趣广泛,文化价值观多元并存,到儒者借助经筵重新定义“帝王之学”,将文章、书艺等科目逐渐排除出帝王理应深入学习的范畴,把这些史料组合在一起,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在与政治的互动中,宋代儒学开出新局面的历史进程。

三 经筵对解经风格的影响

引入《大学》纲目界定“帝王之学”的言说肇自范祖禹,而类似的文字,在北宋后期至南宋的文献中大量存在,不胜枚举。这说明,经由北宋经筵实践探索出来的这套关于什么是“帝王之学”的观念,已经被儒学家们广泛接受。正是因为范祖禹将《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立根之基,不仅他本人被

① 参贾志扬《天潢贵胄》第3章《文学与拘禁》中的“教育与文人文化”部分,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52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乾兴元年十二月甲辰条;同书卷101,天圣元年九月戊寅条;卷103,天圣三年三月己酉条;卷105,天圣五年九月癸卯条;卷110,天圣九年闰十月戊辰条,第4册,第2305、2334、2378、2447页;第5册,第2569页。仁宗成年之后,直至晚年,仍然保留着这个传统,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7,庆历四年三月己卯条;同书卷167,皇祐元年七月丁酉条;卷196,嘉祐七年五月己酉条,第6册,第3565—3566页;第7册,第4006页;第8册,第4761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8,元祐五年九月壬午条,第18册,第10770页。

④ 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第2章《君主独裁体制的确立》,稻香出版社1996年,第61—71页。

⑤ Patricia B.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Patricia Ebrey and Maggie Ba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 229—274.

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追认”为程颐弟子,他在《帝学》中总结的这套观念,也成为后世道学家(或理学家)反复陈述的内容。^①笔者则以为,范祖禹这套观念的形成,是儒家学者在北宋经筵实践中积累而至的成果。范祖禹最重要的老师,也是仁宗晚期至神宗早期重要的经筵官司马光,曾著有《大学广义》一书。这部书已经失传,我们无法确定范祖禹的“帝学”观是否受司马光解说《大学》的影响,但至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下文将举一个具体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至于这套观念在道学群体中得到强烈呼应,甚至可以认为它构成了道学思想最基本的内核,则证明前文提出的观点似乎是合理的:经筵对于道学的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除了关于何谓“帝学”的核心理念外,笔者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北宋经筵对于经典诠释的具体风格改变起到了作用。还是举范祖禹的例子。元祐七年(1092)四月,朝廷发布哲宗皇帝立后的消息,正式典册的日子定在五月戊戌日(即是月十六日)。^②身为侍讲官的范祖禹,之前因暂停经筵进讲而不获入侍,五月初五日后又另受委派,故于五月初四日呈进了一道讲学札子,以弥补他缺席经筵之憾。进奏时间在朝廷宣布哲宗建立中宫之后,正式御殿典册之前,故范祖禹以《易·家人卦》为题,为哲宗讲说齐家治国的道理。^③《家人》卦象巽上离下,六二、九五,阴阳各得其位,故其《彖辞》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这一卦的主要意象在于说明,男女各正其位则家道得立,家道正进而能使天下正。先前解《易》诸家皆不异此说,不仅王弼注、孔颖达疏措意于此,所存汉儒吉羽亦有“妇人自修正于内,丈夫修正于外”云云。^④但汉唐注疏对这一卦象的解释基理,仍是阴阳二元结构在政治伦理上的运用,阴阳的秩序也是天地的秩序,其间有尊卑关系,在家庭里是父子、兄弟、夫妇,措之天下是君臣。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在其位,无僭越、侵夺之象的时候,秩序和谐,天下大治。

同样是讲正家与正天下,范祖禹具体解释《家人卦》的方法显然与汉唐诸儒有重大区别。范祖禹在解释卦象时,以天子为阳为日,皇后为阴为月,引《礼记·昏义》之文云:“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这番敷义是为契合哲宗大婚的时事语境,并缘此切入天子为何正家,如何正家的主题。在范祖禹看来,仅仅强调阴阳二极各正其位,并未穷尽该卦意蕴,关键是怎样才算是正位了?以及该如何正位?范祖禹指出,只有当父子各自具备慈孝的德性,兄弟各自具备友恭的德性,夫妇各自具有义听的德性,这样的家庭才可以被称为是“正”的。人们在扮演各自角色的时候,又该如何去获得相应的德性呢?达到正家的目的之后,后续目标又是什么呢?范祖禹再次举出了《大学》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行次第。正心是各正其位的唯一路径,如果其他家庭成员的心、行不正,则对这个家庭负有主要责任的人物需要更加努力地正自己的心与行,以达到感化的目的,使得他们各正其心、各正其行,并达到齐家的目的。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家齐之后,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推而广之,措之天下,使天下同化。为说明这个问题,范祖禹举舜、文王、太任等前代圣王为例,比如舜如何处理与顽父瞽叟、顽弟象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接受尧的二女之后正夫妇人伦,如何以这套正心、化人的方法御于邦家,推及天下。总之,范祖禹是希望年轻的哲宗皇帝能够相信,一切的根本在于正心。哲宗皇帝应先正己心,使得新婚的皇后也能自正其心,自安其位。帝后之心得正,其位得安,由近及远,教化所行,国可治,天下可平。这就是范祖禹在文末总结的“以家道治天下”,也是“欲正天下必自家始”的政治伦理次序。

① 关于范祖禹是否程颐弟子,朱熹和吕祖谦之前曾发生过争论。参拙文《〈伊洛渊源录〉与早期道统建构的挫折》,《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

② 《宋史》卷17《哲宗本纪一》,第1册,第334页。

③ 范祖禹:《进家人卦解义札子》,《范太史集》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100册,第277页下—280页上。

④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4《家人卦》,阮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上册,第50页。王应麟辑、惠栋增补《郑氏周易注》卷中《家人卦》,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古经解汇函》本,页5b—6a。

与汉唐注疏相比,引入《大学》八纲目来具体落实如何正家,是范祖禹解《家人卦》最重要的特色。这套说辞,在道学思想成熟之后成为老生常谈;引《大学》来解释其他经典,自南宋以后也成为常见现象。这两点从前文所举张九成的《孟子解》、陈经的《陈氏尚书详解》都能看得出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北宋中叶,范祖禹如此解释经典的风格并不多见,因此是具有前驱性的。胡瑗的《周易口义》和程颐《伊川易传》在解释《家人卦》时,与范祖禹有些相近。胡瑗在解释《家人》六四、九五等爻时,都提到“以治家之道移于国”,或“假此治家之道以治于天下”,与范氏“以家道治天下”之义同。胡氏《口义》在解《家人卦》“利女贞”之卦辞时,也引了《大学》“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的则训,但导出的结论是“治家之道,在女正为始”,其说与范氏异。^①程颐《伊川易传》解《家人卦》,有“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动不可易”,“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等语,思路与范氏相近。^②但程颐解此卦并未明引《大学》原文,论说理路与范氏也有所不同。此外,与范氏同时或略早的重要解《易》作品,如张载《横渠易说》,苏轼《东坡易传》,皆不及此义。唯一与范氏一样,不厌其烦地引用《大学》八纲目原文以论证如何正家,并由正家而正天下路径的,是司马光的《温公易说》。^③《四库全书总目》称《温公易说》:“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得之言”,并指出强调“学”对于人自我成就的决定性意义,是司马光解《易》最重要的特点之一。^④其解《家人卦》,文辞虽较范氏简易,但就征引《大学》,强调“学”的次第程序及其意义而言,这两者的确是当时解《易》作品中最为接近的。从司马光和范祖禹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司马光、范祖禹师生二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强调帝王正心的重要性?这师生二人也是两代经筵官,承担着以儒家伦理规范两代帝王行为的责任。他们对帝王由正心而治国、平天下路径的论说,其实折射出当时士大夫通过经筵讲学来影响帝王个人品格,进而影响帝国政治的参与路径。司马光和范祖禹在阐述这些理论时,因为有经筵制度平台与讲读官进说渠道,所以他们的言论是有的放矢,也往往有具体语境。当这些话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普及,甚至沦为后世道学家的陈词滥调时,话语应有的语境被剥离,人们只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是宋儒的通见,却忽略了这些见解是通过怎样的渠道积累起来的。

通过司马光、范祖禹的例子我们看到,道学成熟之前,宋儒的修齐治平说并非空谈,而是与经筵讲读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政治参与机制。所以说修齐治平理论被宋儒重新发现并大做文章,其最初的源头是政治,而非纯学术。宋儒之所以能够做成这篇文章,是因为经筵讲读为儒者提供了制度平台与保障。故而最先承担起挖掘这套理论的重要角色中,不少是有机会进入经筵为皇帝提供经义资讯的儒家官员。

儒家士大夫借诠释经义参与政治,本来是道学诞生的重要背景之一。但当道学越来越成为一套自我完足的学问体系,并成为部分士大夫的学派性旗帜之后,它与具体政治就产生了隔阂,尽管这套学问在原则上仍然是被希望用来指导政治的。尤其是当狭隘的道统观在南宋中后期逐步确立后,以程颐为核心的北宋五子成为道学正宗,司马光被摒除在道统之外,范祖禹被“指派”为程颐门人,那些真正影响道学核心观念形成的政治与制度因素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宋儒重视《大学》的过程与经筵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已如前文所揭。它和《论语》、《孟子》、《中庸》结合,成为新的经典体系,即《四书》体系,也与宋代的经筵讲学活动有着很强的联系。限于篇幅,不能在此展开,容另撰文叙述。

〔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初阳)

① 胡瑗:《周易口义》卷6《家人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册,第336—339页。

② 程颐:《伊川易传》卷3《家人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9册,第295—298页。

③ 司马光:《温公易说》卷3《家人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册,第608页下—609页上。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2《温公易说》条,上册,第5页下—6页上。

Abstract**City Flood and Controlling in Loess Platea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Based on 10 Typical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LI G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had been serious problems of flood in the 10 cities. The bad underlying surfaces of the 10 cities area, including the terrains, rivers, and the lakes or pools, were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to cause flood.

Initial Analysis on the Sanitation Management of Public Environment in Concession of Modern Tianjin **REN Yun - lan**

As a city of commercial ports with 9 concessions, Tianjin accepte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European cities quite early, especially o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environment. All these advanced modes conducted relevant concepts and played a demonstrative role o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environment from the level of system and institution setting.

On the Retrieval of Shanghai Concession Mixed Court in 1926 **ZHANG Li**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Mixed Court had a right expansion during the several decades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869, which seriously injured the judicial sovereignty of China. It has been an appeal for years for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o retrieve the Mixed Court. Finally, only limited rights were taken back in negotiation, these efforts were valuable and significant.

After The Motherland Soldiers Were Arrested——Germination of “Qu Shiwen Incident” of Hong Kong **SUN Yang**

After the Pacific War, the Great Britain went back and continued to rule Hong Kong. Since September, 1945, 10,000 Chinese soldiers had passed Hong Kong to go northwards, which further promoted Hong Kong people's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During this period, a Chinese military officer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theft by Hong Kong police. The onlookers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and rushed to hit the stores, this is the “Qu Shiwen Incident” that started the social instability of Hong Kong for over 2 decades.

Game: Spirit Representation of “Qing Tan” of Wei and Jin Dynasty **QIN Zhe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 of culture history *Game Players*, the specific space, scope and participants of Qing Tan (literally idle talk) reflected the isolation in the game. In other words, this is pure confrontation of wisdom rather than conflicts of thoughts. The game spirit of refusing prejudice and common sayings gave birth to the era character of refusing arrangement in advance, in which the wisdom and purity became the best spirit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x Dynasties.

Influence of Jing Ting Lectures up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JIANG Peng**

Aiming at teaching Confucian classics to emperors, Jing Ting system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Song dynasty. Confucian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regarded it as a channel to partici-

pate in politics and tried to regulate the emperor's behavior through interpreting classics. Also, the appearance of Taoism in Song dynasty had much to do with Jing Ting system.

Analyzing the Appointment of Magistrate of Suzhou Prefecture in the Mid – and Late – Ming China **FAN Li – li**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China, a history spanning almost two hundred years, there were sixty – two magistrates of Suzhou Prefecture. The appointment of such mandarins mirrored not only the system of selecting intermediate and senior level officials but also the political maneuver and power relations in a very traditional sense. This paper examines several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life of magistrates superintending Suzhou.

Rise of “Wu” : Lif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Ming Dynasty **ZHAO Qiang, Wang Que**

The rise of “Wu” is a distinct feature of late Ming dynasty. In social level there was the ris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while in daily life there was the expansion of materialism and seculariz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of such spirit experience as emotion and aesthetics. “Wu” became a carrier relating the lif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f late Ming dynasty.

Pedigree Tendency of Local County Annals: focusing on Rui Jin county anna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Xiao – fang**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ounty annals of Rui Jin Count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some powerful clans and their in-laws almost monopolized the added contents of the county annals. They managed to put materials highlighting their clan position into the annal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edigree tendency is the result of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Best Sellers of Imperial Exams in the Publishing Markets of Late Qing Dynasty **CAO Nan – pi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best sellers of imperial exams in late Qing dynasty, trying to reveal which kind of books are popular among the scholars of that time and what are their influenc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lists of best-sellers formed in certain areas ar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scholars preparing for the exams. But this also simplified the reading world and knowledge scope of the scholars.

From Envoy to Historian: on Hong Jun's visit to Europe **LI Jun – jie**

Hong Jun (1839 – 1893) was sent as an envoy to Russian, Germany, Austria and Japan from 1887 to 1891. By studying Hong's visits to these countries, we could see how diplomacy and westernization of Qing dynasty gained parallel development, the flexibility and limit of the envoy's obligations and chance and conditions for Hong's writing about translated texts of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Peach Blossom Spring,” “American Dream,” “Panacea,” and “Cultural Utopia”: Rural Reconstruction Experiments in the 1930s' China **CHI Zhen**

There were various forms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experiment in the 1930s' China.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led the officially – endorsed experiment represented by Jiangning County and hoped that by doing so the county – level politics would be improved.

On the Shaping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s upon State Concepts after the War of Liberation (1945 – 1949) **WEI Chun – hui**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public opinions formed by political journals and their shaping influence upon the